



抗战时的愈炸愈强标语

特约

黄葛树

抗战时，遭受日机长达五年多
狂轰滥炸——

重庆，愈炸愈强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耀健

3 有条不紊坚守岗位

党政机关迁至市郊歌乐山、青木关和北碚之间的迁建区，利用庙宇祠堂、民间空房，或搭建茅草棚屋，照常办公。迁入青木关山间的教育部，甚至发生过豹子夜闯办公室之事。中共南方局从城内机房街迁往城外红岩村。

电力公司总经理刘航琛，在谈到员工坚守岗位时说：“今后无论在任何困难环境下，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电力供给，绝不中辍一日。”自来水公司董事长潘昌猷、经理胡子昂表示：“吾人对于各种原料，如水管之存储，早有充分准备，足敷今后补充之用。退一步而言，敌人即便将水厂全部炸毁，亦不能断绝本市之水源。吾人仅需吸水机一具，即能引江水灌诸水管，而供市民取用。”

公共汽车公司的员工，已习惯闻警停车，疏散乘客。轮渡公司不仅未减少航线，而且新开辟牛角沱至相国寺、大溪沟至刘家台航线。

中央大学、重庆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教育学院、南开中学、树人中学等院校多次遭到轰炸，但师生员工怀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责任感，坚持教学和科研。

新闻出版界克服种种困难，不间断出版发行报刊书籍。当好几家报社被炸毁时，协商出版10大报联合版。加入其中的有《中央日报》、中共南方局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、最大民营报纸《大公报》、全国金融财政报纸《时事新报》等，以及代表地方势力的《新民报》《国民公报》代表地方进步力量的《新蜀报》、代表工商界的《商务日报》。联合版存世3个多月，共出99期，在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一段佳话。

4 没见一个人淌眼泪

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在《重庆一瞥》中写道：“从昆明来，一路上想，重庆经过那么多回轰炸，景象该很惨罢。可是，想不到！我坐轿子，坐洋车，坐公共汽车，看了不少的街，炸痕是有的，瓦砾场是有的，可是，我不得不吃惊了，整个的重庆市还是堂皇伟丽的！街上还是川流不息的车子和步行人，挤着挨着，一个垂头丧气的也没有。”

女作家冰心在《摆龙门阵》中写道：“我的朋友们都瘦了，都老了，然而他们是瘦老而不是颓倦。他们都很快乐，很兴奋，争着

报告我以种种可安慰的消息……在这里我又看见一种力量，就是支持了三年多的骆驼般的力量。”

记者于鸣写道：“孤零和苦难，把他们锻炼得坚强，刚毅。在六个难民收容所，我没有看见一个人淌眼泪！相反的，我曾看见一位30余岁的家庭妇女，没受过什么教育，气愤地说：‘我真不该是女人，要是男子汉，一定报仇去！’”

女作家林无双在《重庆战时风光》中写道：“奇怪的是当战争拖下去时，中国的士气越来越高。收复一座城池，在空袭后就有提灯会游行来庆祝。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舟比赛。我们依然照样生活，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，立即拿起书包上学去。”“炸弹怎能摧毁我们的士气，怎能摧毁我们的精神？它可以落下而且爆炸，但我们无论如何却要抗战到底。”

5 轰炸唤醒重建中国决心

重庆军民坚决抗敌，广受外国友人好评。

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《为亚洲而战》中写道：“实际上，重庆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恐慌，许多人度过了所有的空袭，而且没有逃难。从全体居民来说，民气正一天天进步着。日本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，但它不能毁灭这个城市的精神，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。”

德国友人王安娜在《中国——我的第二故乡》中写道：“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，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。”

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发表评论称：“中国人民过去曾备尝痛苦，在忍耐力和持久力方面，更具悠久传统，决不会因任何胁迫放弃其抗战建国目的。目前全世界任何地域，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，可能都赶不上中国。”

甚至连敌人也发出哀叹。多次参加轰炸重庆的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，在报告中写道：“单凭轰炸，使其屈服是绝不可能的。”

“愈炸愈强”，这是书写在山城断垣残壁中的一幅标语，它充分体现了重庆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。

(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)

船，一律免费疏散市民。短短两天，疏散人口达25万人，效率之高，史无前例。

2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

国难当头，全民动员。在渝各党派、各团体发表宣言或通电，一致表示决心共赴国难，迎击敌人。

1939年3月，重庆《国民公报》连续13天报道各界捐献盛况。工商界积极响应，丝绸业、棉纺业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、新亚建筑公司、旅馆业、绸缎布业、餐饮业等，争先恐后捐款。

金融界方面，迁渝的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农民银行、美丰银行等，以及广东省银行、福建省银行、江西裕民银行、浙江地方银行等分别捐献1万元至10万元不等。

民间也捐献踊跃。七岁小孩梁阿富抱来陶制存钱罐，当场敲碎，献零钱49.88元。“小广寒”书场女艺人蒋俊卿、俞美云、张梅卿等，“林山楼”艺员朱雅云、朱雅仙，“大广寒”艺员张月秋，捐出首饰及现金。

各界人士捐赠的实物有金砖、金戒指、银锭、银条、银手镯等。宋美龄捐献一枚金质勋章。巴县民众捐献粮食5000石，江津土绅捐粮4000多石。

在为前线将士征募寒衣活动中，海外侨胞不遗余力。据当时的媒体报道，旧金山华侨捐款100万元、香港同胞捐45万元、缅甸华侨捐10万元、菲律宾华侨捐15万元、印度尼西亚华侨捐5万元。南洋侨领陈嘉庚先捐51000元，后又补寄20万元。

1939年11月，全国征募寒衣300万件任务完成，从重庆分发10个战区。1943年5月，全国慰劳总会发起重庆各界鞋袜劳军运动，要求每甲（居民点）至少捐献布鞋、布袜各一双。

各项义卖活动、建国储蓄活动、“一元献机”活动如火如荼。冯玉祥将军义卖书法作品。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也捐出微薄薪金。

国民政府先后颁布《征兵令》《兵役法》等，每天均有新兵在朝天门登船，出川杀敌。据统计，战时四川和重庆向前线输送将士61万名。修建白市驿机场、中坝机场，调集民工数十万人。

重庆《大公报》1944年12月报道：“在全市29个登记处登记者已有5812人，内中男5449人、女363人。各界从军情绪异常热烈。军委会一位逾龄中将

参军准予为列兵。一位独眼大学生体格检查不合格，再三恳求入伍，至于哭泣。而一般女青年则更多痛哭陈词，要求参加。”

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，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之久的狂轰滥炸，市民伤亡32829人、财产损失约100亿法币（按1937年比值计算）。

天空满目蝗虫般的敌机，地面四处火光冲天，医院躺满伤员，防空洞人满为患。英国路透社记者报道：“重庆市区的一半一片黑暗，电话也不通。居民沿街而睡，挤满了街道。”国际社会普遍担心，中国还能不能扛下去？抗战还能支撑多久？

重庆军民以实际行动作了回答。

1 隧道内生产轻机枪迫击炮

1939年初，原调往成都休整的空军第四大队将士主动请战，移驻重庆。第四大队是中国空军劲旅，此前已击落敌机80架，为纪念以身殉国的首任大队长高志航，又名“志航大队”。飞行员大部分都经历过扬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汉口等地的战斗，身经百战。

为加紧备战，重庆防空司令部扩充高射炮炮位，增设探照灯，加紧修凿防空洞、防空壕。广泛进行防空知识教育，举办防空人员训练班、防空情报训练班，印制大量宣传资料，分发各机关、团体。普及防空、防毒知识，制定《空袭时国民信条》，公布公共防空洞地址，实行灯火管制、避难管制。

各兵工厂则全力生产。第21兵工厂将轻机枪、迫击炮、工具生产线疏散到铁路隧道内开工。第25兵工厂两年内建成山洞厂房40幢，将铜壳、弹头、装配生产线迁入其中。第50兵工厂从1939年到1941年，在长江铜锣峡北岸峭壁下，一字形开挖22个长方形山洞，生产高射炮、机关枪。重庆的5个兵工厂，1941年生产各种火炮526门、炮弹60万发、子弹1.07亿颗，手榴弹、炸药包、曳光弹分别数以万计。仅第21兵工厂生产的枪支，每月便可武装一个整编师。

民品工厂也日夜开工生产，钢铁厂、化工厂、造船厂、纱厂、棉纺厂、毛纺厂、机器厂、玻璃厂、面粉厂等企业，一俟警报解除，马上投产。

当时的《中国工人》杂志报道说：“我们试游江畔，便觉得人烟骤增，机声聒耳。看见数十家内迁工厂，正在平地建造。有的正在开工制造，其奋发努力，犹如前方战士在战场。”

新成立的紧急疏散委员会，划定沙坪坝、磁器口和高滩岩等地为迁建区，山洞、歌乐山等地为疏散区。1939年5月5日至6日，全市公私车辆、轮船、木

紧急装运抗战物资

人们在空袭下坚持生产

防空部队严阵以待